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李刚磊，邵云飞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摘 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和民营企业创新仍不清楚。另外，现阶段混改仍存在“混而不改”“混而不合”“动力不足”等关键问题，提高国企经营和治理效率的主要改革目标还未实现。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厘清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方向，既有助于理解和指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实践，也有助于丰富混改及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另外，结合 Citespace、Vosviewer 等 3 种计量可视化工具的分析结果，本文构建了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并进一步评述了框架中每个部分的研究现状及不足，旨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创新；国有企业改革；文献计量；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1）09—0122—15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意愿和效率对国家提高创新水平和提升创新质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李增福等，2021）。混合所有制改革（下文简称：混改）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有效途径（蔡贵龙等，2018a；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正是我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之一。混改是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下文简称：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口（沈昊和杨梅英，2020；綦好东等，2017），也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沈昊和杨梅英，2019）。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王春燕等，2020）。在 2020 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勇挑重担，在应急保供、医疗支援、复工复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发挥了顶梁柱、压舱石的重要作用，使人们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程承坪和陈志，2021）。但是，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因缺乏创新核心技术的突破一直被专家、学者们所诟病。委托代理链过长、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政企不分等问题，导致其创新动力不足，效率低下（Lin 和 Li，2008；王春燕等，2020；李春玲等，2021）。国家统计局 2017 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活跃度和投入水平相对偏低、创新成效和层次相对不足等问题，无论是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比、研发投入强度，还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新产品的新颖度，国有企业都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向东和余玉苗，2020a）。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提升国企创新水平、效率和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向东和余玉苗，2020b；李增福等，2021）。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逐渐崭露头角，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顶尖科技实力的创新型企业。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已有

收稿日期：2021—04—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突破性创新价值共创的机理研究：跨界、演化与商业逻辑转换”（7187202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组合’与创新能力研究：涌现、构型与治理”（71572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政策研究”（17ZDA051）

作者简介：李刚磊，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通讯作者）邵云飞，博士，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402家企业的关键技术来源于自主开发。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前民营企业仍存在较强的融资约束和信贷歧视现象。在当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增速换挡、结构阵痛及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已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竺李乐等，2021）。《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在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集中的结构调整过程中，正面临退出产能过剩领域并寻找优质投资渠道的现实需求。因此，在当前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受阻和国有资本急需寻找优质投资渠道之间存在双向契合的背景下（竺李乐等，2021），这种以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而进行的混改形式，是否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亦或是存在其他抑制因素？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另外，现阶段混改仍存在“混而不改”“混而不合”“动力不足”等关键问题，提高国企经营和治理效率的主要改革目标还未实现（蔡贵龙等，2018b）。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也存在“起步早，发展晚”且理论滞后于实践的问题（沈昊和杨梅英，2019），缺乏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沈红波等，2019）。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混合所有制”为主的国企改革成为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混改才成为学术界广泛探讨的热点话题和中心议题之一（陈林和唐杨柳，2014；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郝阳和龚六堂，2017；陈林，2018；李红阳和邵敏，2019）。目前，混改研究已经进入百家争鸣的“丛林”阶段，涉及为何混合、如何混合、混改成效等系列主题（马连福等，2015），但仍存在“头重脚轻”“重国轻民”“重结果轻过程”等问题。在“国企混改影响因素-混改的实施过程-混改治理效果”的因果逻辑链条中（蔡贵龙等，2018a），大量研究热衷于检验实施混改对国企的治理效果（沈红波等，2019；王美英等，2020），对混改的影响因素（蔡贵龙等，2018b）、混改对民营企业的治理效果（潘爱玲等，2019）、混改对国有及民营企业的治理路径等关键问题还鲜有涉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2020）判断，“十四五”时期必将是国企混改加速推进的阶段。届时，具有国有和非国有混合产权结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大量出现。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厘清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构建混改的研究框架，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研究方向，对助力“十四五”时期国企混改的加速推进及混改创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混合所有制经济虽不是我国特有，但是具有很强的转型特色（郝阳和龚六堂，2017）。就其在一个经济体中的重要性而言，我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可能源于此，国际上关注混合所有制问题的研究较为缺乏（陈仕华和卢昌崇，2017）。以“mixed ownership reform”作为主题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进行精准检索（李加鹏等，2020），对英文文献进行系统学习。然后，针对中文期刊论文运用Citespace、Vosviewer等专业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及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

具体方法分为5个步骤。第一，对发文趋势进行初步分析。本文首先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篇关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期刊论文检索，来源类别选择CSSCI。结果如图1所示，截至2020年共检索到1011篇文献，且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13年之后。另外，通过中国知网学术关注度指数也可以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学术关注度在2014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图2）。第二，对研究概况进行初步分析。运用Vosviewer对1011篇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图3）。不难发现，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学者们已经在公司治理、员工持股、公司绩效、民营经济、企业创新等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

第三，对研究文献进行筛选精炼。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至此混改更为清晰地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框架，迅速成为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方明月和孙鲲鹏，2019）。根据图1和图2也可以发现，2014年混改相关发文量和学术关注度都呈现爆发式增长。因此，本文把研究文献的时间范围进一步限定在2014—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2006年遴选和认定的30种重要学术期刊，具有一定的学科代表性和学术水平。因此，本文将同时入选CSSCI（2019—2020版）来源期刊目录和上述范围的经济和管理学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经济管理》《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动态》等经济学重要期刊（共计25种），发表的所有论文作为初始样本。从中筛选出符合本文要求的研究成果，以把握当前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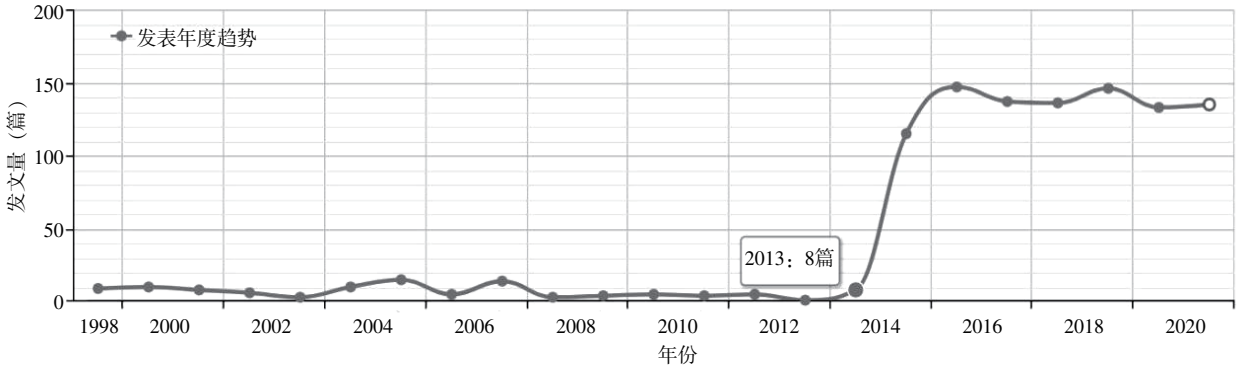

图 1 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篇关摘”检索（共 1011 篇，2014 年及以后 898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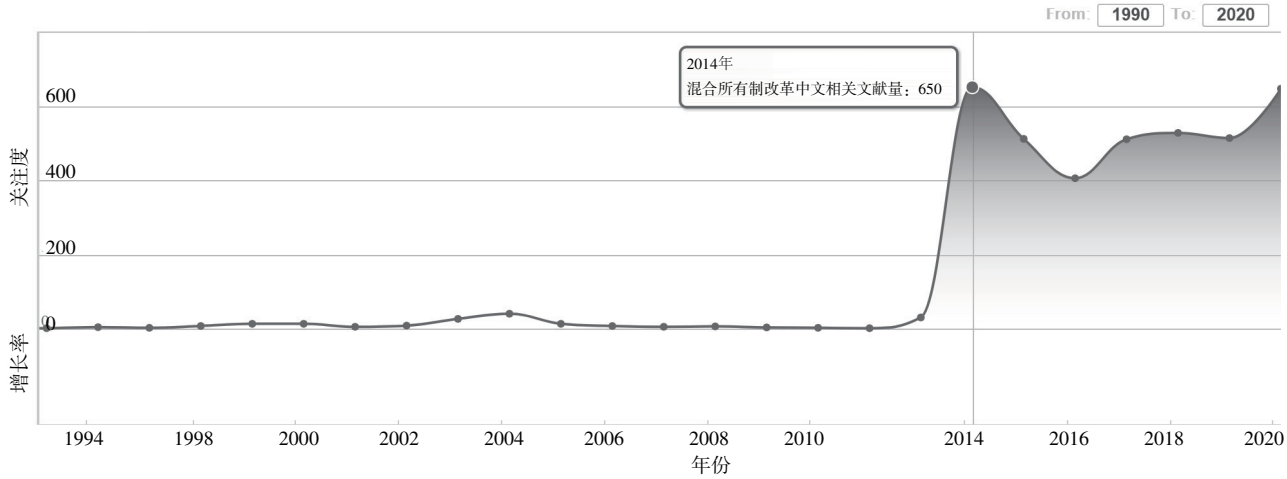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知网“混合所有制改革”学术关注度指数（1990—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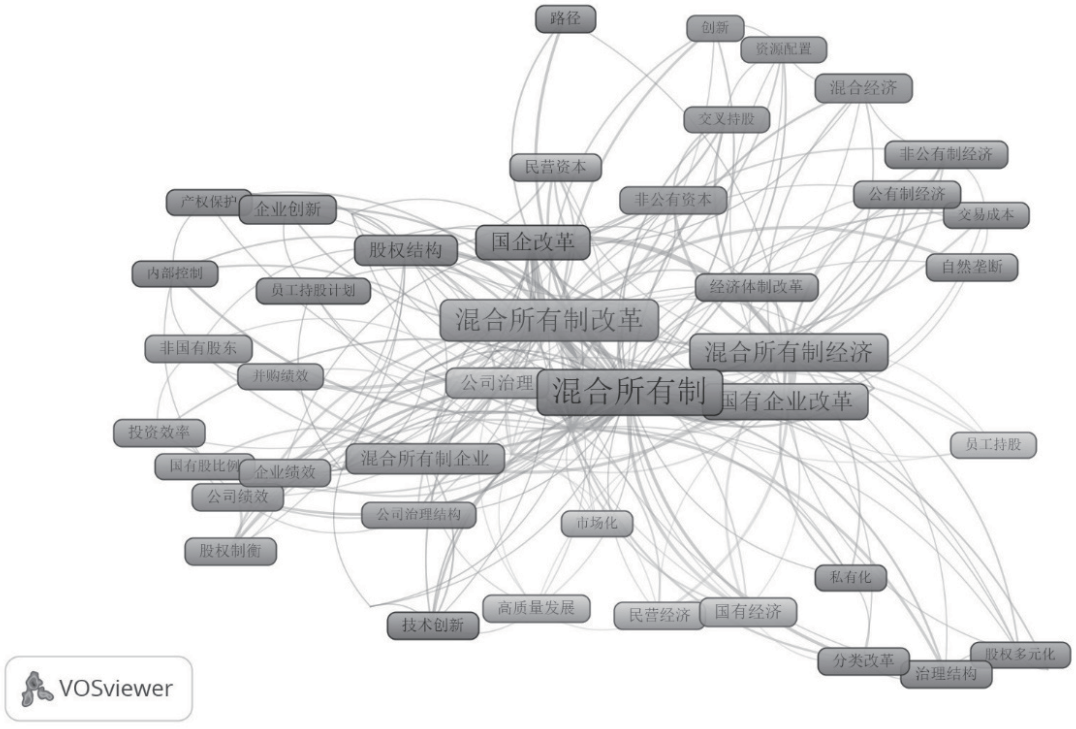

图 3 Vosviewer 对 1011 篇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

第四，逐一精读、编码核心文献，并对其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以“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混改”作为篇名、关键词和摘要对25种期刊进行逐一检索。分别阅读每篇文章摘要和全文，删除研究主题不符的文献及会议通知、征稿启事等非论文内容。然后进一步增加文献中被遗漏的参考文献和该领域高被引论文，最终将符合条件的2014—2020年间178篇中文文献作为核心分析对象（刘洋等，2020）。本文遵循文献内容分析的典型步骤，创建了一份列出178篇文献的excel文件，包含题目、作者、发表时间、来源期刊、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理论视角、摘要、主要结论等信息，以促进描述性和解释性审查。这一过程借鉴了扎根理论方法中对于数据编码的思路，从原始数据出发依次进行初级编码和聚焦编码，归纳相应概念以构建研究架构（周冬梅等，2020）。然后，对178篇文献运用Citespace、Vosviewer等专业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及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定量计量分析（详如图4~图6）。对混改领域的研究有一个全景图式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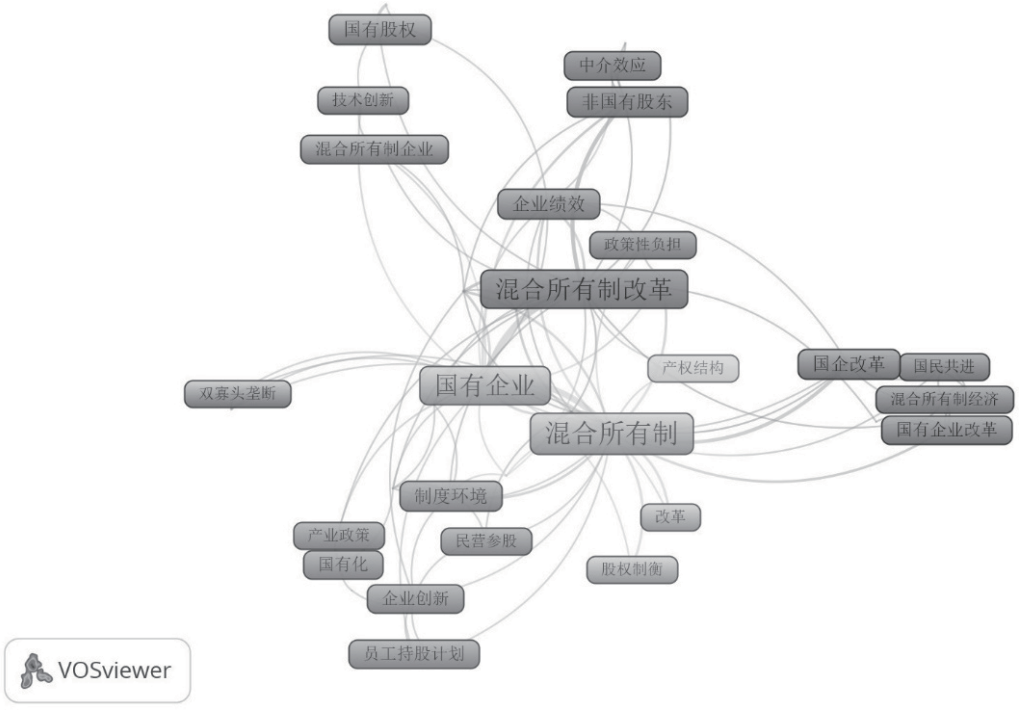

图4　对178篇文献运用Vosviewer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图5　对178篇文献运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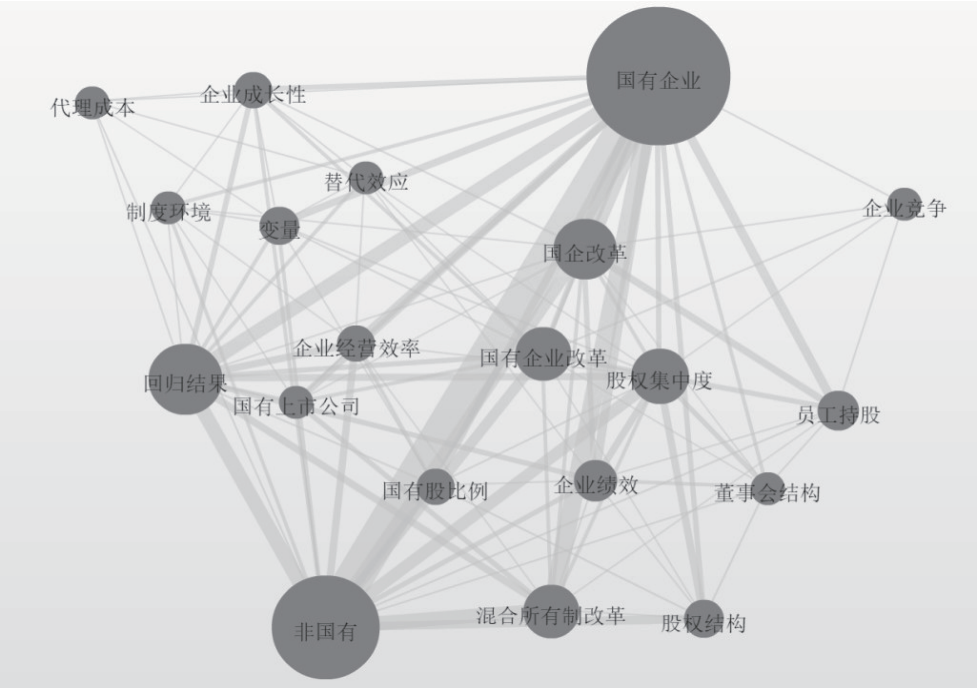

图 6　对 178 篇文献运用中国知网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对计量分析结果和文献编码分析结果的深入理解，5 类边界相对清晰的混改研究主题得以涌现：混改的研究基础（包括内涵和意义、优越性、发展趋势及竞争环境等）、混改的影响因素（包括高管跨体制联结、政府放权意愿、产业政策、产权保护和行政壁垒等）、混改的实施过程（包括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国有企业引入外资、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员工持股计划等）、混改的治理效果（包括经济绩效、创新水平、内部控制质量、资本配置效率、风险承担水平等）、混改的最优实现机制（包括最优股权结构、动力机制、实现路径、国民共进、高质量共同发展、特殊管理股制度等）等。

第五，聚焦混改与企业创新研究。作为某一时段内被引频次急剧增加的关键词汇，突现词能够被用来展现一个领域中学界的研究趋势变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国内混改研究的演化发展趋势，运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最终得到混改研究领域的前 7 个突现词。从图 7 可以看出，混改与企业创新研究在 2019 年迎来爆发期，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混改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话题之一。因此，本文把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并进一步把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期探明其中的影响机制和未来研究方向。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00—2021年
政府质量	2000	7.66	2000年	2013年	
政府补助	2000	7.66	2000年	2013年	
国企混改	2000	6.90	2000年	2013年	
创新	2000	6.85	2000年	2013年	
混合所有制	2000	3.69	2014年	2015年	
混合所有制改革	2000	5.77	2019年	2021年	
企业创新	2000	3.82	2019年	2021年	

Top 7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7　对混改文献运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一）混改与企业创新研究的发展趋势分析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促使非国有股东持股和参与公司治理的关键一步，也是改善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环境、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Guan et al，2021）。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立对国有控股股东的权力制衡机制、形成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内部控制监督机制来实现（Tan和Tan，2017）。无论是在生产率还是在创新方面，国有企业总是被认为效率较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2017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平均比非国有企业低四分之一。代理问题、政策负担和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企业更可能无所作为（Megginson et al，2014；D'Souza和Nash，2017）。另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由行政部门任命，通常缺乏专业的管理技能（Gan et al，2018）。混合所有制模式是否能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仍不清楚（Zhang et al，2020）。

混改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一是政策负担。为了实现某些政治目标，政府会对企业经营实施强有力的干预，这将使国有企业在特定的政治目标下做出短期投资决策，放弃风险和利润更高的创新投资项目，减少新的技术创新（Gao et al，2018）。不同类别资本之间的交叉持股将增加政府干预私有化公司的成本，帮助公司开展更多的增值创新活动（Zhang et al，2020）；二是公司治理。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营者激励和监督机制，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有助于企业改善公司治理，降低经营者道德风险，通过提高非国有股比例、职工持股计划、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制等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Aghion et al，2013）；三是行政垄断。与其他形式的垄断不同，行政垄断通过许可证来减少竞争对手，造成生产力和创新的滞后。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打破垄断形式引入竞争，迫使国有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Zhang et al，2020）。

为了进一步探析混改与企业创新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本文针对中文期刊论文运用Citespace进一步对该领域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结果如下图8所示。作为混改领域的研究热点，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数量从2014年至今屡创新高，呈稳步增长趋势；然后，对研究概况进行初步分析。运用Citespace对样本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图9、图10），不难发现企业创新在该领域的重要性仅次于混改本身。另外，员工持股计划作为混改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下文将从混改如何影响国有/民营企业创新、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等方面具体展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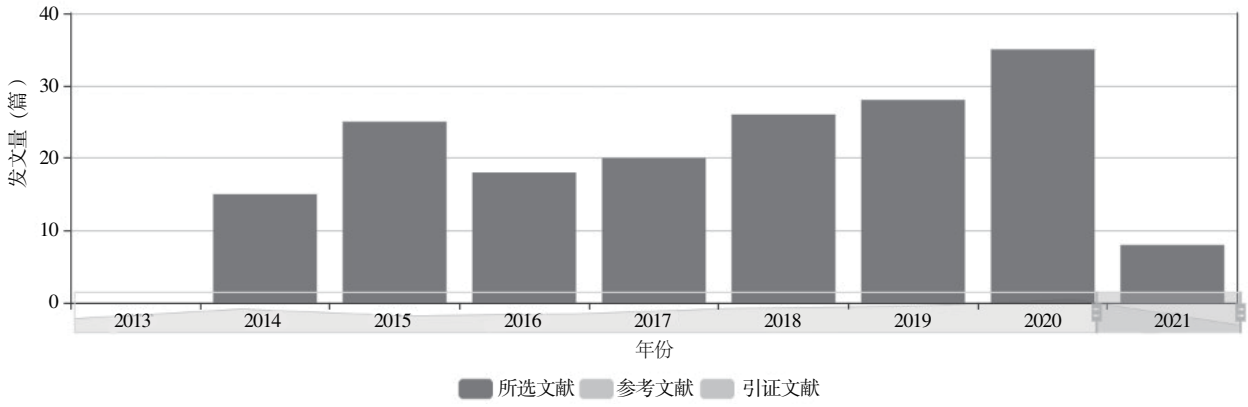

图8　混改与企业创新研究发文量统计

（二）混改如何影响国有企业创新

近年来，国有企业创新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当前的学术研究热点之一。Zhang et al（2020）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一种外生的监管冲击，分析当前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显著的影响，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而且增加了所有专利和发明专利的数量。此外，与竞争性行业相比，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垄断行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大。Li et al（2020）从股权结构调整和控制权配置两个维度考察和评价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认为混合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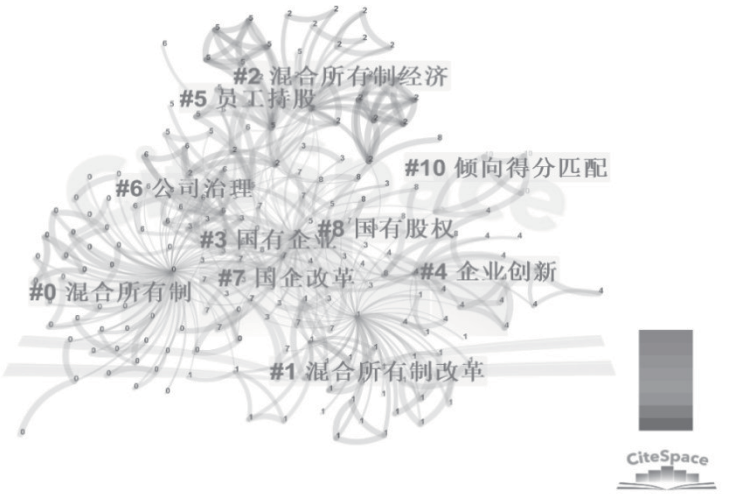

图 9 对创新领域文献运用 Citespace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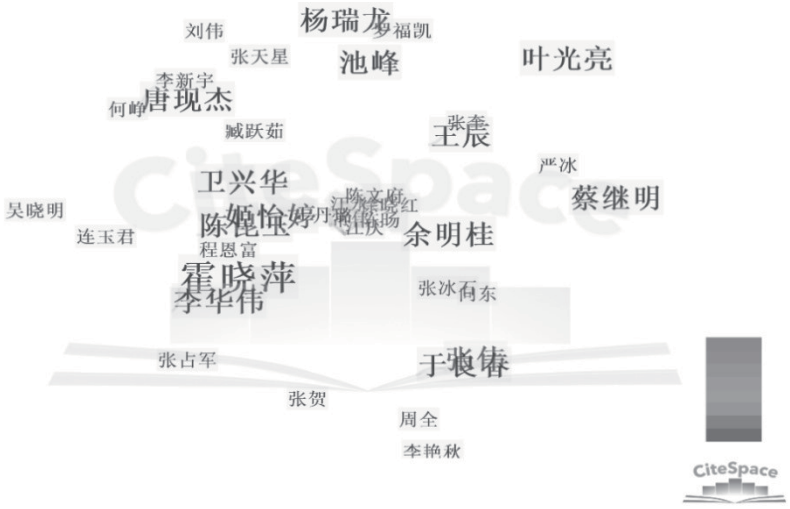

图 10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东的多元化、混合股权的深度、混合股权的控制对国有企业的探索性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多数学者从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产出)两个维度单独进行研究。其中,对研发投入的研究更为丰富。非国有资本比重(张伟和于良春, 2014)、股份比例多样化(解维敏, 2019)、股权混合程度(罗福凯等, 2019)、股权融合度(朱磊等, 2019)与控制权转移(杨兴全和尹兴强, 2018)均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另外,混改也可以通过抑制股东资金侵占行为,提升国企创新水平(朱磊等, 2019)。田鸣等(2019)还检验了国有股权对研发视野(广度和深度)的直接作用,发现国有股权对研发广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解维敏(2019)、李红阳和邵敏(2019)发现与外资股东相比,私有股东更能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则认为外资持股比例对民营化企业的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府放权意愿高和一般商业类国企中,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王春燕等, 2020)。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通过获得政府补贴、降低管理成本、加强内部控制及完善高管薪酬激励等途径来促进企业创新(杨运杰等, 2020;李增福等, 2021)。

对创新绩效(产出)的研究较少。王业雯和陈林(2017)基于"拟自然实验"理论框架,发现混改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无论从混合深度还是混合广度来说,所有制混合均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张斌等, 2019)。但是,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陈林等, 2019)。也有学者同时兼顾了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但是结论却大相径庭。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任曙明等(2019)认为非国有股权比例与国企的创新活动(投入和产出)显著正相关,并且促进效应主要源自经理人观,而不是政治

观。钟昀珈等(2016)、尹美群和高晨倍(2020)则发现混改会抑制国企的创新效率(产出)和研发创新(投入)，混改后企业的专利数量显著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主要来源于经理人观，而非政治观(向东和余玉苗，2020b)。

总之，对混改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成果基本达成一致结论，但研究视角还不够全面，忽略了高管治理的重要作用。除了完善公司治理、降低政府干预和抑制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之外，混改还可以通过哪些机制影响国企的创新？需要后续研究继续挖掘。

(三)混改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包含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也包含国有资本参股进入非国有企业。现有研究多从国企的角色定位出发，探究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效果，较少有文献为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治理效果提供经验证据，导致混改研究存在“重国轻民”的问题。因此，该如何正确看待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这一特殊的混改形式，是当前一个亟待验证的问题(罗宏和秦际栋，2019)。但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并未就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这一话题展开广泛探讨。创新固有的高投入、长周期、强信息不对称等特点，促使民营企业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融资以获取创新资源。但在当前中国直接融资市场不够完善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将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给有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创新项目，而对民营企业的创新项目则持谨慎观望态度(竺李乐等，2021)。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入股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为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支持提供了重要途径。

民营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成为现有国有企业的共同所有者，从而改变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地位的改善可以减少民营企业遭受基于所有权的歧视，缓解融资约束的同时也可以降低其债务成本。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也有可能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劣势(Chu和Song，2015)，使民营企业被允许进入传统上国有企业独有的市场，优先获得政府资源，并有能力与政府形成合法的合同关系(Li et al，2020)。Zhang et al(2020)发现混改对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民营企业在参与混改之后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政治联系方式。Chen et al(2017)也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削弱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敏感性，从而提高了投资效率。罗宏和秦际栋(2019)则认为国有股权参股提高了家族企业投入创新活动的意愿，增加了家族企业可投入创新活动的资源，最终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竺李乐等(2021)发现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的混改，主要通过缓解企业因“所有制背景”而遭受的信贷歧视的作用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从而带来“国民共进”的创新绩效。邵云飞等(2019)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参与混改对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另外，国有资本参股带来的融资便利性，显著缓解了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李增福等，2021)。

由此可见，目前对引入国有资本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研究较为分散，也同样忽视了高管治理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资金投入只是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之一，参与混改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和政府干预也有可能降低企业的创新意愿。因此，参与混改到底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还有哪些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值得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四)员工持股计划如何影响企业创新

员工持股计划是国企混改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沈红波等，2018)。现有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创新和经济绩效两个方面。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的促进作用。员工持股计划可以通过“利益绑定”功能，提升员工在创新过程中的个人努力、团队协作和稳定性，也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在影响因素上还存在分歧，孟庆斌等(2019)认为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员工持股，而非管理层持股。而且，员工持股计划持股人数的扩大可能引发“搭便车”问题，不利于创新产出。周冬华等(2019)则认为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高管认购比例越高，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 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经济绩效的治理效果还不明确。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国企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和减少超额雇员等公司治理层面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沈红波等，2018)，且可能存在“员工持股陷阱”(沈昊和杨梅英，2019)。但是，在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行业实施该计划，能显著提高公司的现金流量增速和盈利增速(张望军等，2016)。

不难发现，针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大样本实证研究较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治理效果也不明确，员工持股计划能否改善国企创新绩效？对国企内部控制质量、资本配置效率、政策性负担、多元化经营等方面又会有何影响？均是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

结合三种计量工具的分析结果及编码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这个领域内文献深入阅读后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提出了“一条主线，两个关键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图 11）。这一框架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兼顾“研究基础（支撑）”和“最优实现机制”两个关键点。不仅丰富了“国企混改影响因素-混改的实施过程-混改治理效果”的因果逻辑链条（蔡贵龙等，2018a），而且指明了混改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其中，《意见》指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接下来该部分将针对研究主线的三个部分进行详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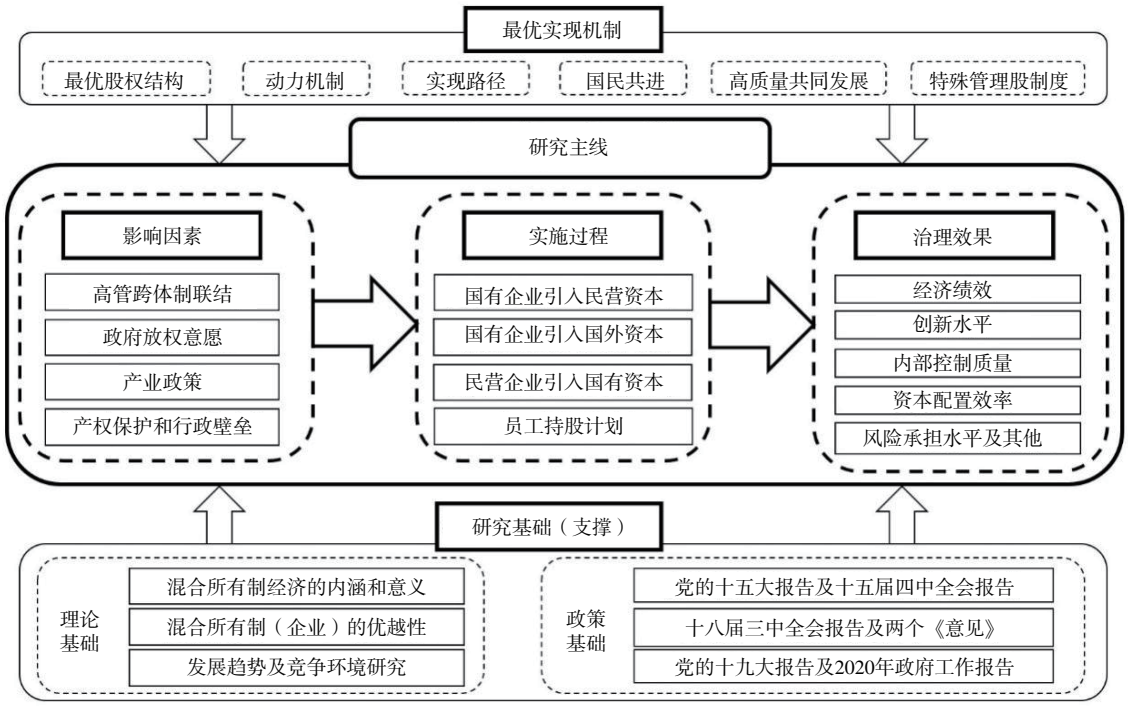

图 1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框架

（一）实施过程

国家发改委提出鼓励 3 种混改方式：一是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二是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对发展潜力大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三是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从而进行股权激励（张辉等，2016）。綦好东等（2017）也认为采用“内引外投”双向投资和实施员工持股是推动混改的有效实现路径。这里“内引”主要指引入非国有资本投资者，特别是战略投资者参与改革；“外投”则主要指国有资本以兼并重组或新设企业的方式投资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非国有企业。因此，本文根据混改方式把混改研究分为三类：国企引入非公有资本、民营企业（包括家族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和员工持股（潘爱玲等，2019），其中对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和员工持股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国企引入非公有资本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国企引入民营资本（本文把对国企引入的非公有资本不做具体分类的研究也归为该类）和国有企业引入外资等两种主要形式，其中对国有企业引入外资的研究较少。

（二）治理效果

1. 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

大多数学者支持混改能够改善国企经济绩效的观点。武常岐和张林（2014）、刘晔等（2016）及李红阳和邵敏（2019）分别以资产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和国企利润率为具体指标，证明了引入非国有资本可以改善国

企的经济绩效。从作用机制来看，王甄和胡军（2016）认为国有转民营对公司绩效的提高是隧道效应的减弱和经理人代理问题的降低共同作用的结果。混改也可以通过降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张辉等，2016）和抑制非效率投资（任广乾等，2020）来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郝阳和龚六堂（2017）则认为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进而提高了公司绩效。从研究视角来看，上述研究大多只从股权结构视角入手，忽视了高管治理的重要作用。因此，谢海洋等（2018）发现了这个研究空缺，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派任董监高、国企绩效显著正相关，并且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李明敏等（2020）也发现异质股东股权对企业混改绩效仅发挥制衡效应，而异质股东非财务控制权对企业混改绩效既具有协同效应，也具有制衡效应，且制衡效应强于股权制衡。也有部分学者发现，混改和国企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马连福等（2015）发现混合主体深入性与公司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李双燕和苗进（2020）则认为公司治理制衡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

国企内部控制有效性较低会滋生高管腐败、导致过度负债等问题，内部控制的改善对于规范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提升企业治理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刘运国等，2016）。一方面，混改可以通过提高国企的会计信息质量、现金持有水平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等方式，改善内部控制质量。刘运国等（2016）、曾诗韵等（2017）及蔡贵龙等（2018）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发现，只有当非国有股东向国企委派高管时，才能有效改善国企的内部控制质量、会计信息质量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杨兴全和尹兴强（2018）、卢建词和姜广省（2018）也分别证明了混改程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现金股利分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混改也可以通过抑制国企的高管腐败、过度负债水平（吴秋生和独正元，2019）及企业费用粘性（叶松勤等，2020）等方式，改善内部控制质量。

现有研究认为混改可以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任广乾等，2020）、提高并购整合能力等方式，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非国有股东股权结构参与和高层治理参与均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向东和余玉苗，2020a），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有效抑制中央国企的投资过度和有效缓解地方国企的投资不足两个方面。但是，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企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只有在委派高层成员维度才能有效发挥（孙姝等，2019）；另一方面，具有董事会权力的非实际控制人还可以通过减少无效并购（源头控制）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过程控制）这两条路径来提升国企并购效率（逯东等，2019）。

2. 国有企业引入外资

现有研究基本认可国企引入外资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结论。外商资本的加入，可以更好的提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的效率（吴万宗和宗大伟，2016），有效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步丹璐和屠长文，2017），还助于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许为宾和周建，2017）。但是，对于国企引入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孰更优，还没有一致结论。马连福等（2015）和黄速建等（2020）认为外资股东的制衡效应和对国企绩效的提升作用优于民营股东。与之相反，解维敏（2019）、李红阳和邵敏（2019）发现与外资股东相比，私有股东更能提高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李文贵和余明桂（2015）则认为外资持股比例对民营化企业的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

总之，目前学者对外资参与混改治理效果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是与之相关的文献数量较少，专门研究国企混改中外资治理效果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是研究维度不够全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两个维度，缺少对内部控制、资本配置效率、风险承担、政策性负担、多元化经营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国企引入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孰更优也未达成一致结论。

3. 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

多数研究支持国有股东参股对民营企业经济绩效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国有股权依靠其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为民营企业起到制度层面的声誉担保作用，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发展获取较多的经济资源与发展空间（余汉等，2017）；另一方面，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郝阳和龚六堂，2017），减弱了民企的隧道效应（王甄和胡军，2016），进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绩效。也有研究提出不同观点。李文贵和邵毅平（2016）发现民营企业在国有化后虽然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并缴纳了更少的税收，但同时却比非国有化企业聘用了更多的员工、确认了更多的管理费用及支付了更高水平的员工工资，并最终具有显著更差的绩效表现。陈建林（2015）也认为，家族所有权比例增加且非控股国有股权比例减少时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不难发现，混改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且缺乏最新研究成果，也未得出一致结论。另外，研究视角也不够全面，忽视了高管治理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研究混改对民营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后果及作用机制，是混改领域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

国有股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声誉机制和替代制度，在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宋增基等，2014）和行业准入（姚梅洁等，2019），提高产权保护水平（张铄和宋增基，2016），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潘爱玲等，2019）等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另外，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治理效果研究，目前在内部控制质量、资本配置效率、风险承担水平、政策性负担、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还未有涉及，未来研究可以加以补充。

（三）影响因素

根据上文可知，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混改的治理效果，发现混改对于完善国企公司治理机制和提升国企经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这其中隐含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混改得以顺利推进。然而，目前混改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毛新述，2020）。因此，深入研究混改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遗憾的是，鲜有文献研究国企混改进程的影响因素（蔡贵龙等，2018b），导致现有混改研究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提高产权保护（李文贵和余明桂，2017）和产业政策扶持力度（李文贵和邵毅平，2016），可以提高民营企业国有化的积极性；而政府放权意愿越高（蔡贵龙等，2018b）及拥有跨体制联结的高管（陈仕华和卢昌崇，2017）对国有企业主动参与混改具有积极作用。本文认为，混改的影响因素研究是混改领域未来的研究重点，对提升混改效率，进一步调动民营企业和国企参与混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五、未来研究展望

至此，本文基于文献综述阐明了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及结果，构建了一个初步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基于这一框架，结合已有研究内容，接下来本文将重点从混改的实施过程、治理效果和影响因素3个维度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一）混改的实施过程

本文根据混改方式把混改的实施过程分为：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国有企业引入外资、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和员工持股计划四类。其中，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成果最为丰富，涵盖经济绩效、创新水平、内部控制、资本配置效率、风险承担等多个方面。相比之下，现有研究对于国有企业引入外资、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和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特别是在目前国家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治理效果和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另外，混改相关的案例研究还较为匮乏，且研究对象单一。现有案例研究的对象多为中央或地方的大型国有企业，缺少中小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典型案例。在混改即将全面铺开的背景下，更多的典型企业案例有待挖掘。

（二）混改的治理效果

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①混改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结论并未达成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其中的作用机制还未探明，比如在倒“U”型关系中，当非国有股权比例超过临界值之后抑制国企绩效的机制是什么？②对混改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研究成果基本达成一致结论，但研究视角还不够全面，忽视了高管治理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除了完善公司治理和降低政府干预、抑制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之外，混改还可以通过哪些机制影响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③鲜有研究关注混改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仅有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验证。

国有企业引入外资。目前学者对其参与混改治理效果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一是相关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维度不够全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两个方面，未来研究可以从内部控制、资本配置效率、风险承担等视角给予关注。而且，对于国企引入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孰更优也未达成一致结论。

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①混改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经济绩效的研究较少，缺乏最新研究成果，也未得出一致结论。而且，研究视角也不够全面，忽视了高管治理的重要作用。因此，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究混改对民营企业经济绩效的治理效果及作用机制，是未来混改领域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②引入国有资本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研究尤为匮乏，且同样忽视了高管治理的重要作用；参与混改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创新？还有哪些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值得未来研究深入探讨；③目前，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治理效果研究，在内部控制质量、资本配置效率、风险承担水平、政策性负担、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还未有涉及，未来研究可以加以补充。

员工持股计划。针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大样本实证研究较少，对企业经济绩效的治理效果也不明确，员工持股计划能否改善国企经济绩效？对国企内部控制质量、资本配置效率、多元化经营等方面又会有何影响？均有待验证。

（三）混改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了混改的治理效果，鲜有文献研究国企混改进程的影响因素（蔡贵龙等，2018b），导致现有混改研究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就当前的研究趋势及实践意义而言，迫切需要从学理上探究国企混改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十四五”时期国企混改的加速推进谏言献策（陈仕华和卢昌崇，2017）。目前，仅有个别研究探讨了高管跨体制联结、产权保护、政府放权意愿、产业政策等因素对混改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参与意愿、制度环境、国有企业异质性等其他可能影响混改进程的因素还有待发掘。本文认为，混改的影响因素研究是混改领域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对进一步提升混改效率和调动各参与主体积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未来研究重点关注。

六、结论

通过对1998—2020年间发表于国内重要期刊的1011篇混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归纳，以及对核心文献的精读编码整理，结合Citespace、Vosviewer等3种计量可视化工具的分析结果。本文厘清了混改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构建了一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框架，并且从3个维度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主要研究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厘清了混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结果，进而指出现有研究的短板及未来研究方向，既有助于理解和指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管理实践，也有助于丰富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第二，本文构建了以“影响因素-实施过程-治理效果”为主线，兼顾“研究基础（支撑）”和“最优实现机制”两个关键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框架，填补了混改研究缺乏系统研究框架的空白；第三，本文在评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混改的实施过程、治理效果和影响因素3个维度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文虽然关注了混改总体的发文趋势，但没有就主流管理期刊和经济学期刊的发文内容作对比，无法刻画主流管理思想所关注的主题和经济学期刊中所关注的主题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第二，研究虽然运用了定量数据分析，但没有就研究中的数据做深层次的挖掘，忽视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第三，混改研究是多学科问题，本文主要关注了管理学和经济学期刊中的代表文献，对教育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的期刊文献没有太多关注。

参考文献

[1] 步丹璐，屠长文，2017. 外资持股、制度环境与审计质量[J]. 审计研究，198(4)：65-72.

[2] 蔡贵龙，柳建华，马新啸，2018.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J]. 管理世界，34(5)：137-149.

[3] 蔡贵龙，郑国坚，马新啸，等，2018. 国有企业的政府放权意愿与混合所有制改革[J]. 经济研究，53(9)：99-115.

[4] 曾诗韵，蔡贵龙，程敏英，2017. 非国有股东能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竞争性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与经济研究，31(4)：28-44.

[5] 陈建林，2015. 家族所有权与非控股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研究——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333(12)：99-114.

[6] 陈林，2018. 自然垄断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自然实验与成本函数的分析[J]. 经济研究，53(1)：81-96.

[7] 陈林，唐杨柳，2014.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基于早期国企产权改革大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191(11)：13-23.

[8] 陈林，万攀兵，许莹盈，2019.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35(10)：186-205.

[9] 陈仕华，卢昌崇，2017. 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转让股权”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84(5)：107-118，169，188.

[10] 程承坪，陈志，2021. 非国有资本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研究[J]. 中国软科学(2)：125-132.

[11] 方明月，孙鲲鹏，2019. 国企混合所有制能治疗僵尸企业吗？——一个混合所有制类啄序逻辑[J]. 金融研究，463(1)：91-110.

[12] 郝阳，龚六堂，2017. 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J]. 经济研究，52(3)：122-135.

[13] 黄速建，刘美玉，张启望，2020. 竞争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94-109.

[14] 解维敏，2019. 混合所有制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39(4)：1067-1078.

[15] 李春玲，袁润森，孙熠，2021.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创新投入[J]. 预测，40(1)：38-44.
[16] 李红阳，邵敏，2019. 私人资本参与、政策稳定性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J]. 经济学(季刊)，18(4)：1329-1350.
[17] 李加鹏，吴蕊，杨德林，2020. 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融合：历史回顾及未来方向探讨[J]. 管理世界，36(5)：19，204-219.
[18] 李明敏，李秉祥，惠祥，2020. 异质股东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混改绩效的影响——基于股东资源与治理结构双视角[J]. 预测，39(1)：26-34.
[19] 李双燕，苗进，2020. 差异化股权制衡度、行业异质性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证据[J]. 经济管理，42(1)：5-24.
[20] 李文贵，邵毅平，2016. 产业政策与民营企业国有化[J]. 金融研究，435(9)：177-192.
[21] 李文贵，余明桂，2015. 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J]. 管理世界，259(4)：112-125.
[22] 李文贵，余明桂，2017. 产权保护与民营企业国有化[J]. 经济学(季刊)，16(4)：1341-1366.
[23] 李增福，黄家惠，连玉君，2021. 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企技术创新[J]. 统计研究，38(1)：119-131.
[24] 刘洋，董久钰，魏江，2020. 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 管理世界，36(7)：198-217，219.
[25] 刘晔，张训常，蓝晓燕，2016.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 PSM-DID 方法的实证研究[J]. 财政研究，404(10)：63-75.
[26] 刘运国，郑巧，蔡贵龙，2016. 非国有股东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吗？——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349(11)：61-68，96.
[27] 卢建词，姜广省，2018. 混合所有制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分配[J]. 经济管理，40(2)：5-20.
[28] 逯东，黄丹，杨丹，2019.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J]. 管理世界，35(6)：119-141.
[29] 罗福凯，庞廷云，王京，2019. 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吗？——基于我国 A 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研究与发展管理，31(2)：56-66.
[30] 罗宏，秦际栋，2019. 国有股权参股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376(7)：174-192.
[31] 马连福，王丽丽，张琦，2015. 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J]. 中国工业经济，328(7)：5-20.
[32] 毛新述，2020.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5(3)：21-28.
[33] 孟庆斌，李昕宇，张鹏，2019. 员工持股计划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企业员工视角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35(11)：209-228.
[34] 潘爱玲，刘昕，吴倩，2019. 跨所有制并购、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成本[J]. 会计研究，379(5)：3-10.
[35] 綦好东，郭骏超，朱炜，2017.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力、阻力与实现路径[J]. 管理世界，289(10)：8-19.
[36] 任广乾，冯瑞瑞，田野，2020. 混合所有制、非效率投资抑制与国有企业价值[J]. 中国软科学，352(4)：174-183.
[37] 任曙明，李馨漪，王艳玲，等，2019. 民营参股、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J]. 研究与发展管理，31(3)：59-71.
[38] 邵云飞，李刚磊，徐赛，2019. 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学季刊，4(2)：63-88，135.
[39] 沈昊，杨梅英，2019.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和公司治理——基于招商局集团的案例分析[J]. 管理世界，35(4)：171-182.
[40] 沈昊，杨梅英，2020. 混改条件下股权结构与国资监管方式的选择——基于多案例角度研究[J]. 管理评论，32(3)：323-336.
[41] 沈红波，华凌昊，许基集，2018. 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经营绩效：激励相容还是激励不足[J]. 管理世界，34(11)：121-133.
[42] 沈红波，张金清，张广婷，2019.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控制权安排——基于云南白药混改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35(10)：206-217.
[43] 宋增基，冯莉茗，谭兴民，2014. 国有股权、民营企业家参政与企业融资便利性——来自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414(12)：133-147.
[44] 孙姝，钱鹏岁，姜薇，2019. 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J]. 华东经济管理，33(11)：134-141.
[45] 田鸣，王腾，张阳，等，2019. 国有股权让中国企业在创新中“分心”了吗？——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研究与发展管理，31(5)：137-147.
[46] 王春燕，褚心，朱磊，2020.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企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11)：23-32.
[47] 王美英，陈宋生，曾昌礼，等，2020. 混合所有制背景下多个大股东与风险承担研究[J]. 会计研究，388(2)：117-132.
[48] 王业雯，陈林，2017.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促进企业创新?[J]. 经济与管理研究，38(11)：112-121.
[49] 王甄，胡军，2016. 控制权转让、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J]. 经济研究，51(4)：146-160.
[50] 吴秋生，独正元，2019.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J]. 经济管理，41(8)：162-177.
[51] 吴万宗，宗大伟，2016. 何种混合所有制结构效率更高——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与分析[J]. 现代财经(天津

财经大学学报），36(3)：15-25，35.
[52] 武常岐，张林，2014. 国企改革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及企业绩效[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5)：149-156.
[53] 向东，余玉苗，2020.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投资效率的影响[J]. 经济管理，42(1)：25-41.
[54] 向东，余玉苗，2020.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研究与发展管理，32(5)：152-165.
[55] 谢海洋，曹少鹏，孟欣，2018.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与企业绩效——基于非国有股东派任董监高的中介效应[J]. 华东经济管理，32(9)：123-131.
[56] 许为宾，周建，2017. 混合所有制、股权制衡与国企过度投资：基于政治观和经理人观的解释[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32(2)：53-62.
[57] 杨兴全，任小毅，杨征，2020. 国企混改优化了多元化经营行为吗?[J]. 会计研究(4)：58-75.
[58] 杨兴全，尹兴强，2018.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J]. 管理世界，34(11)：93-107.
[59] 杨运杰，毛宁，尹志锋，2020.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提升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J]. 经济学家(12)：71-79.
[60] 姚梅洁，宋增基，张宗益，2019. 制度负外部性与市场主体的应对——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35(11)：158-173.
[61] 叶松勤，凌方，廖飞梅，2020. 混合所有制、政府控制层级与企业费用粘性[J]. 科研管理，41(1)：202-210.
[62] 尹美群，高晨倍，2020. 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权、制度环境和研发创新[J]. 科研管理，41(6)：1-8.
[63] 余汉，杨中仑，宋增基，2017. 国有股权、政治关联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29(4)：196-212.
[64] 张斌，李宏兵，陈岩，2019. 所有制混合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委托代理冲突与股东间冲突的整合视角[J]. 管理评论，31(4)：42-57.
[65] 张辉，黄昊，闫强明，2016.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绩效——基于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家，213(9)：32-41.
[66] 张铄，宋增基，2016. 国有股权对私有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13(12)：1873-1881.
[67] 张望军，孙即，万丽梅，2016.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和问题研究[J]. 金融监管研究，51(3)：90-103.
[68] 张伟，于良春，2014. 混合寡头厂商的合作研发及反垄断控制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314(5)：44-56.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黄群慧，2020.“十四五”时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优化政策研究[J]. 经济学动态，709(3)：3-21.
[70] 钟昀珈，张晨宇，陈德球，2016. 国企民营化与企业创新效率：促进还是抑制?[J]. 财经研究，42(7)：4-15.
[71] 周冬华，黄佳，赵玉洁，2019.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J]. 会计研究，377(3)：63-70.
[72] 周冬梅，陈雪琳，杨俊，等，2020. 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36(1)：206-225，243.
[73] 朱磊，陈曦，王春燕，2019.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 经济管理，41(11)：72-91.
[74] 竺李乐，吴福象，李雪，2021. 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特征事实与作用机制——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逆向混改”视角[J]. 财经科学(1)：76-90.
[75] AGHION P，VAN REENEN J，ZINGALES L，2013.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3(1)：277-304.
[76] CHEN R，EL GHOUL S，GUEDHAMI O，et al，2017. Do state and foreign ownership affect investment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privatization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42：408-421.
[77] CHU S，SONG L，2015. Promot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for deepening market reform in China：A resource allocation perspective[J]. China & World Economy，23(1)：47-77.
[78] D’SOUZA J，NASH R，2017. Private benefits of public control：Evidenc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state ownership[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46：232-247.
[79] GAN J，GUO Y，XU C，2018. Decentralized privatization and change of control rights in China[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31(10)：3854-3894.
[80] GAO H，HSU P，LI K，2018. Innovation strategy of private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53(1)：1-32.
[81] GUAN J，GAO Z，TAN J，et al，2021. Does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work？Influence of board chair on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22：51-59.
[82] LI B，PAN A，XU L，et al，2020. Imprinting and peer effects in acquiring state ownership：Evidence from private firms in China[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61：1-15.
[83] LIN J Y，LI Z，2008. Policy burden，privatization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6(1)：90-102.
[84] MEGGINSON W L，ULLAH B，WEI Z，2014. State ownership，soft-budget constraints，and cash holdings：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48: 276-291.
[85] TAN D, TAN J, 2017. Far from the tree? Do private entrepreneurs agglomerate around public sector incumbents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8(1): 113-132.
[86] ZHANG X, YU M, CHEN G, 2020. Does mixed-ownership reform improve SOEs'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state ownership[J]. China Economic Review, 61: 1-22.

How Does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Affect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Review of Research and Future Prospects

Li Ganglei, Shao Yunf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Mixed ownership reform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key breakthrough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and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owever, how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ffects the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s still unclear. In addi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re are still some key problems in the mixed reform, such as "mixed but not changed" "mixed but not suitable" "lack of motivation", and so on. The main reform objectives of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not yet been achieved. Therefore, in the key perio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results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will be clarified, and then the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existing research will be revealed, which will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and guide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but also help to enric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CiteSpace, vosviewer and other three measurement visualization tool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with the main lin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governance effect"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further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shortcomings of each part of the framework,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research.
Keywords: mixed ownership reform; enterprise innovation;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bibliometrics; research prospects